

DOI: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24.03.006

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创造机理：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张燕, 潘亚楠

(河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乡村产业的发展能有效盘活乡村资源、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 以资源编排理论作为基础, 构建“资源编排—利益联结—创造价值”模型, 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和“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下的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实现过程。研究结果表明, 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编排行为的差异, 特别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方式。资源编排与利益联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关系的迭代升级特征。

关键词: 资源编排; 价值创造; 乡村产业; 案例研究;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2024)03-0072-14

一、问题提出

中国一直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 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 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需要盘活乡村资源、激发乡村内在发展潜力^[1]。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产业快速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新型服务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关注度持续增加^[2], 相继提出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等多业态的发展方式^[3]。这些实践为乡村探索多业态、多形式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承担不同使命, 呈现出阶段性的产业发展模式演变。

一是起步阶段(1978—1994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这种模式是受市场需求推动, 由成熟农户带动小农户发展本土特色产业, 形成农户自主经营的“农户+农户”模式, 即由经营实力较强的农户进行管理, 最后按照资源、设备等进行分红的模式。

二是探索阶段(1992—2012年)的“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招商的方式将企业的技术、设备、信息等资源引入乡村中, 以此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的经济, 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引入的企业利用乡村的自然、文化等资源生产出极具地方特色的产品, 快速形成产业群。

三是跨越阶段(2013年至今)的“政府+企业+农户”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下, 聚集当地具有禀赋优势的产业, 形成具有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的地理空间, 从而能有效地汇集配套产业, 实现区域的繁荣发展。

目前, 存在较多关于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 但大部分的研究以解释某一特定地区或单一的产业发

收稿日期: 2023-09-11; 修回日期: 2023-11-01

基金项目: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文明视角下公众参与文化旅游项目大群体决策问题研究”(G2020208002)

作者简介: 张燕(1980—), 女, 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潘亚楠(2000—), 女, 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展模式为主要内容,关于产业模式如何形成与演变的过程缺乏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讨论,也缺乏对不同产业发展模式下资源是如何转化成能力以实现价值创造的探索。

本文从资源编排理论入手,依靠“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逻辑,具体剖析了乡村如何通过资源编排激发内生动力、嵌入外生资源以实现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做出了两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从乡村产业编排行为出发,具体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和“政府+企业+农户”三个产业发展模式下的乡村资源编排行为、利益联结机制与价值实现过程之间的内在机理,丰富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内在发展过程研究;第二,使用探索性案例和方法具体解释了由资源构建到能力的转化再到价值创造的实践过程,相较于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依靠外界资源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本文为乡村产业撬动内在资源,激活自身发展活力,实现内外资源整合的过程提供了路径指引。本文扩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范围,阐释了从多角度剖析乡村产业模式的动态演化与实践机理。

二、理论与方法

(一) 资源编排理论

资源编排理论由西蒙等(Sirmon et al., 2011)^[4]提出,核心在于将资源分配到活动的关键路径上助力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只有将资源转化为能力才能创造价值,使企业在竞争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5]。从理论上讲,资源编排理论是基于资源基础论引入了动态利用资源的过程,实现由“拥有者”向“利用者”过渡^[6]。该理论主要以企业为对象,形成“资源构建—捆绑—利用”的框架,随后,部分学者以此框架为基础对资源编排理论的内涵进行情景转换和改进,衍生出资源获取^[7]、资源共享^[8]、资源撬动^[9]、资源协调^[10]、资源开拓^[11]等内容。综合来看,资源编排理论可以视为包括资源获取、协调和开拓的多元化、能动性行为的过程^[12],填补了资源管理与资产编排中的资源利用、管理等问题,能进一步映射出资源编排是行为与价值创造的双重属性^[6]。

已有理论与实证分析为本文提供了新思路,而目前鲜有研究从资源编排理论的角度探究乡村产业的发展过程。本文基于“资源获取—资源协调—资源开拓”的资源编排框架,探究由要素到行为的转变,研究从资源转换为能力产生行动的过程,揭示不同模式下资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

资源编排是通过对乡村产业链内外部进行有形或无形资源的管理,以促进资源的集中使用,实现资源的整合、重组、转化和利用,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创造价值。在资源编排中,乡村发展阶段所需的外部资源,如政府投资、企业资金、人才资源等,通过资源编排行为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并通过与内部已有资源进行重组、叠加从而发挥更大的效用,进而使乡村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从资源编排的行为角度进行探究,资源赋能产生行动通过资源构建、资源束集、资源撬动等多种资源编排的一系列流程,实现资源从外到内组合蓄能,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价值创造作为乡村产业在资源编排与利益联结机制联合下的动态化结果,取决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从机会视角来看,机会识别与市场需求能够促使乡村时刻保持着对市场机会的灵敏性判断,能够通过市场、政策等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后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与想法,以此转化成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新业态、新能力,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从资源基础来看,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乡村资源以动态化、多形态化形式存在,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和农村新兴产业等领域上实现由资源迈向能力的动态化演进,并为后续的乡村产业发展行为奠定了基础;从管理视角来看,价值创造能力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呈现出差异化形式,使用不同的资源编排过程与价值创造机理,解释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和“政府+企业+农户”为代表的乡村产业发展。

现有文献对乡村产业发展价值实现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未厘清在资源与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由此, 本文将以资源编排理论作为理论依据, 构建“资源编排—利益联结—创造价值”模型, 探究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依据资源编排理论可以细化农村资源、解构资源管理行为, 有助于揭示资源交互和协同的过程, 依次解决资源在整合、重组、转化和利用过程中的问题, 勾勒出由资源到价值创造这一完整的乡村产业发展过程, 以此帮助乡村挖掘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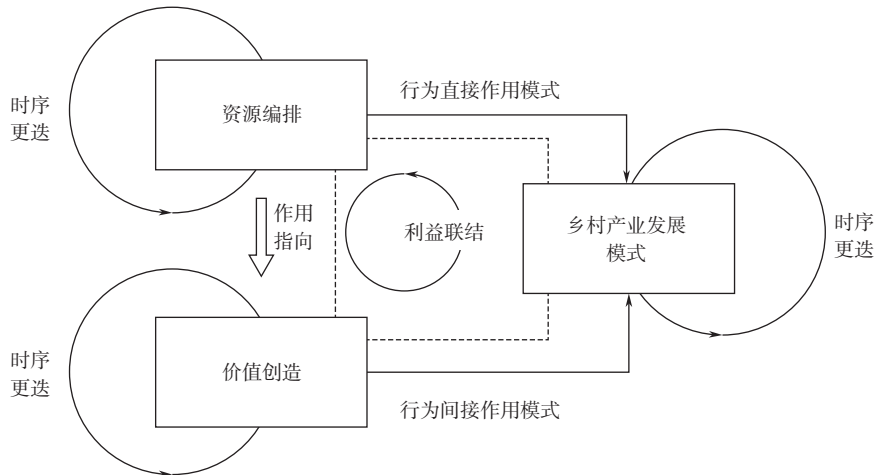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

(三) 案例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 即探究在三种不同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下, 政府、农户和龙头企业在资源获取、协调和开拓上的行为逻辑。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在于: 首先, 本文主要探究乡村如何利用内外部资源开展乡村产业发展活动以促进价值创造能力, 属于“如何”问题的范畴, 适用于案例研究方法; 其次, 提出“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框架探究三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以探究性案例研究更能寻找现象间的关联关系, 并从案例中验证理论框架; 最后, 多案例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案例进行横向对比, 能增加理论框架的说服力、适用性。

本文主要使用从国家乡村振兴局收集的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案例数据的可获取性、真实性, 具体案例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资源编排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例证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典型例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安吉县建立“村级组织+合作社+困难户”利益分配下发展白茶特色产业
龙头企业+农户	贵州省册亨县引入贵州矛香猪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立“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的合作模式
政府+龙头企业+农户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乡人民政府引入蔬菜种植企业, 建立“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格局

本文选取三种产业发展模式下的乡村案例, 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原则: 第一, 兼并重要性原则。选取代表性强的案例, 使研究对未来乡村发展提供有效的启示。第二, 理论目标与案例过程具有一致性。从全国选取 3 个主要发展模式与本文的理论目标相一致的案例, 更能验证理论框架的合理性。第三, 案例具有可获取性。从国家乡村振兴局中选取的三个案例, 在对应的省份都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公众号宣传等可获取的丰富资源, 案例的完整性和多样性都有利于开展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究。

三、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乡村产业模式价值创造过程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主要通过建立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关系，引导乡村形成以农户自主联合为主的市场导向发展，提升农户的自主经营和治理能力，为乡村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新途径。在面临资源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开拓农户自主经营等能力，指导乡村采取高效的资源编排方法，实现从无到有的资源基础构建，并发挥内部资源的组合效应，突破发展壁垒。在此阶段，乡村从三个方面实现资源适配需求，利用短缺资源的采办购置，复制成熟发展路径，实现资源缺口精准填补为主，结合专业资源合理分配的方式，突出乡村在资源获取、利用过程中内部资源的不断组合，蓄力推进农户间的资源基础行动轨迹全面化。通过资源整合下的需求信息和农户自主行为为组织结构内部赋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价值创造过程的核心环节。

市场需求牵引农户快速作出反应，但受到技术、劳动工具等限制，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以内部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效率型资源编排，获取资源的快速整合，弥补生产缺口，发挥资源重组配置的匹配效应。升级已有产业实现更新换代或基于已有的模式培养新服务，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发展能力的转化，完善乡村组合资源框架释放最大化资源价值，解决关键资源间的错配、匹配等问题。以此功能解决农户与成熟农户间的利益联结关系，满足资源结构重组需求和缓解缺口资源不足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完成“缺口资源获取、资源重组利用、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反馈满足”的循环过程，共同面向差异化市场需求，实现满足市场的农产品生产、销售。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思路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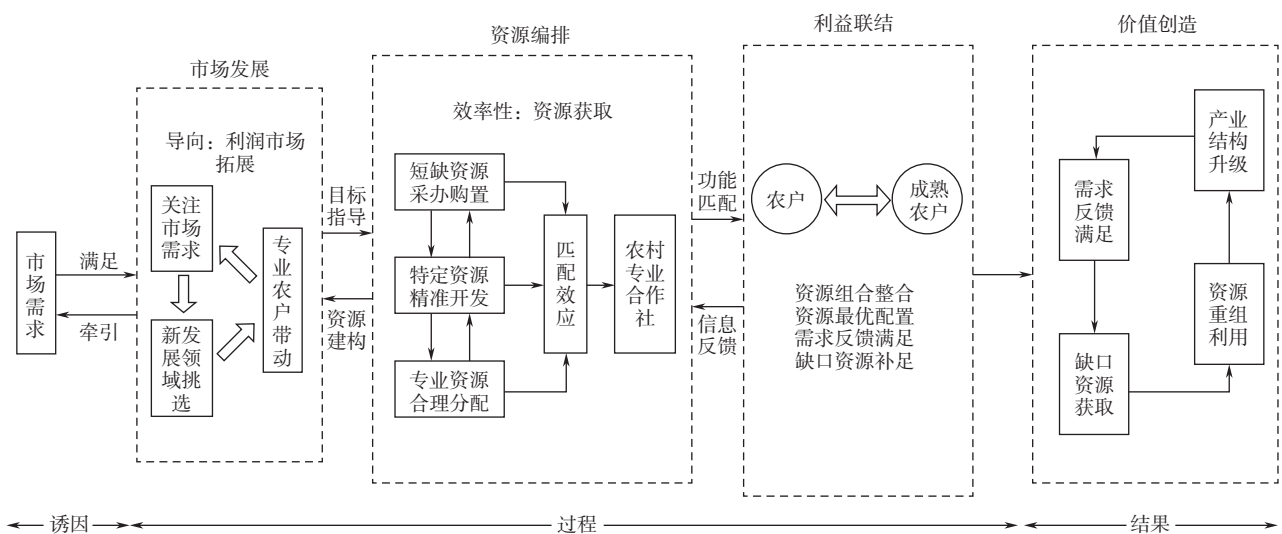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价值创造过程

内部动员改变了农户对内部现存资源的心理、行动与价值观。整合内部现存资源，构建“成熟农户+农户”的利益联结，将整合、获取的新旧资源渗透到生产经营前、中和后的多个生产经营环节中，超越单一的行动效果，缓解发展后续的动力不足、技术不完善等问题。推进合作组织实现进一步合作的动力在于撬动潜在资源，浙江省安吉县、四川省西充县都是在小农户分散、基础资源匮乏的前提下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完成了土地、资本等基础要素的整合。在成功整合、调整后，为实现进一步发展，由成熟的农户带动待发展农户完成初步技术引进。获取更多产业化资源，须引入足量的外界资本从而形成规范化的公司运营模式。

按照“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的逻辑对浙江省安吉白茶专业合作社进行剖析, 具体价值创造过程如图3、表2所示。

安吉县曾是浙江省贫困县之一, 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条件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为寻求一条长远发展路径, 安吉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确定“生态立县”的思想, 发展白茶特色产业, 2003年建立白茶专业合作社, 探索出“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安吉县政府高度重视安吉白茶产业发展,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 扶持发展茶叶产业。在发展前期, 安吉县未形成健全的白茶产业发展结构, 受制于资本、技术等资源限制, 只能形成“农户+农户”的发展模式。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提升, 形成了特有白茶品牌。为进一步发展, 安吉县重新挖掘既有资源的内在价值, 引入外界劳动力、资金等资源, 形成资源组合, 以驱动乡村产业发展和跨领域、跨单位的技术创新, 并于2007年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安吉县在做出上述的资源行为后, 创造了新的价值。一是公共价值得以体现。安吉县人民政府在整个发展周期中不断挖掘安吉白茶的文化底蕴, 力求文化与农业结合, 打造安吉白茶文化, 并通过建立公园、鉴赏基地等为切入口, 提升白茶的品牌建设。二是探究潜在市场价值。构建要素集聚、产业创新和服务提升等协同发展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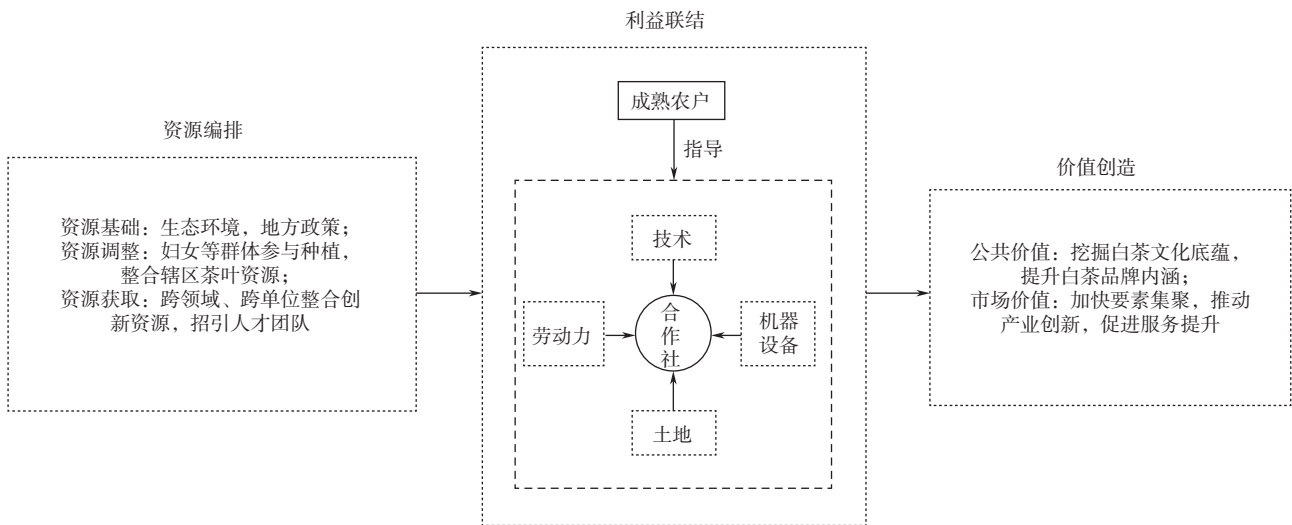


图3 “安吉白茶专业合作社”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2 “农民专业合作社”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生态条件优越, 为安吉白茶的生长提供了优秀的土质、水质以及气候条件, 使茶叶的产量达到了产业化的标准; 地方政策为白茶产业化形成提供资金、技术以及良好市场条件	生态环境; 地方政策
	资源调整	街道通过整合辖区茶叶资源, 借助党建工作促进茶产业的发展, 致力于支持中小型茶农实现规模化和强势发展, 并积极打造“安吉白茶人家”品牌。此外, 引导党员、妇女、返乡青年等群体积极参与茶叶种植, 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从而推动脱贫致富的实现	整合; 扶持茶农; 引导致富
	资源获取	围绕安吉白茶等主导产业大力招引各类顶尖领军人才及团队; 跨领域、跨单位整合创新资源, 推动多部门、多单位、全链条协同创新; 围绕白茶产业发展需求, 打造安吉白茶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 整合原有茶园用工管理、投入品追溯监管、农产品追溯等平台	招引人才; 整合创新资源; 数字化建设

表2(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利益联结	资源匹配	2003年形成“农户+农户”发展模式； 2007年为推动进一步发展，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	农户联合； 成立公司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深入挖掘白茶的文化底蕴，将文化与农业相结合，打造了安吉白茶文化； 建设主题公园等方式将安吉白茶推入大众视野，提升了安吉白茶的品牌内涵	文化底蕴； 品牌内涵
	市场价值	加快要素集聚，助力白茶产业新发展； 推进产业创新，促进创新能力新提升； 围绕服务提升，构建产业共富新格局	要素集聚； 产业创新； 服务提升

(二)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尽管乡村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但大部分乡村存在着新生弱小的特征，需要吸引外部主体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建立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基础。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农产发〔2021〕5号)，该政策建议通过多渠道的支持措施来帮助乡村发展，支持龙头企业的创新发展。在多元化产品需求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寻求与企业合作的最佳机会，规划自身资源优势并选择与之有互补性的资源，发挥异质资源和互补资源的协调发展效应，汇集成更具有价值潜力的资源束。在此期间，以新旧资源重组、互补资源协调和优势资源聚合的方式形成资源编排框架，搭建全新资源获取渠道。

乡村的资源协调行为推动企业自主配对目标产业，乡村通过加强与外部资源合作的方式实现内外资源的互助互惠关系。企业为乡村输送互补型、异质性的资源，助力乡村产业从“效率型资源编排行为”向“协调型资源编排行为”过渡，以此实现利益市场的拓展。多方互助协作实现互补资源的汇集，推进乡村资源与企业资源之间的高效配置弥补市场的异质性需求空白，以此实现“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下的最大化价值创造。龙头企业可通过主动合作扎根乡村，利用乡村资源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实现资源互补以此树立品牌优势；农户模拟为企业生产部门，参与企业管理体系中的任务分工，从而共创多元价值，完成“互补资源汇集、资源高效协调、产业优势互补、多元相互协作”的循环体系。

具体市场主导的“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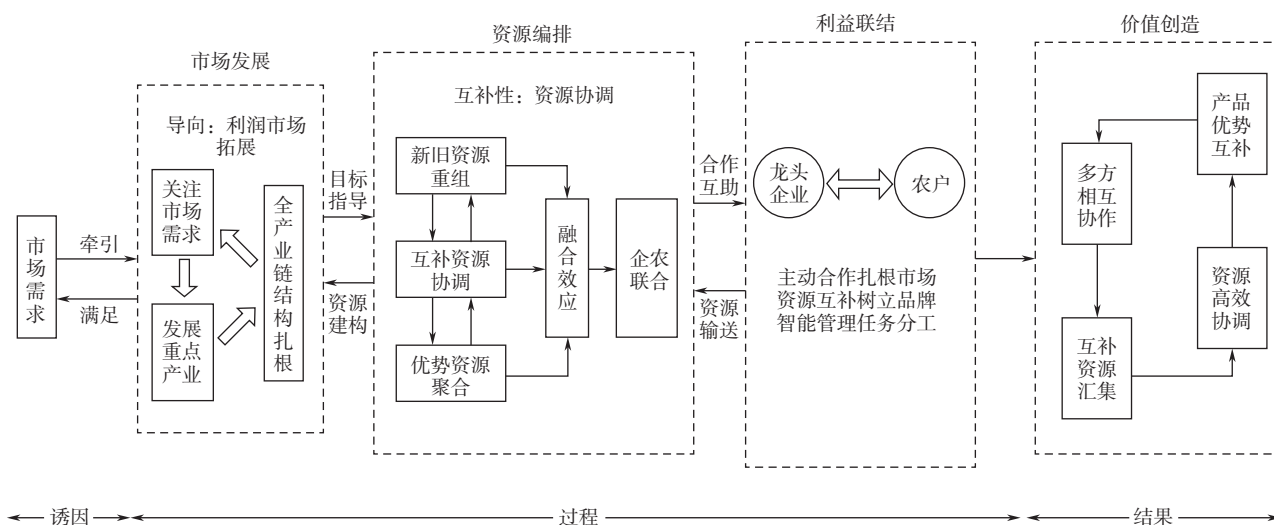


图4 “龙头企业+农户”的价值创造过程

乡村产业在渡过艰难的自我崛起阶段之后, 消费者逐渐建立起对乡村特色产品的品牌认可度, 但是消费者的满足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比如农产品产量、质量、丰富性等, 这是农户通过调整自身现存资源也无法满足的。匮乏的经济来源与不健全的资本市场都促使乡村亟需外界资本力量的援助, 其中龙头企业起着助燃剂作用, 为乡村提供市场信息和最新市场发展动向, 调动自身资金、人才等资源引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 实现内外界的互补性资源协调, 扶持乡村特色产业, 建立健全的产业体系。企业与农户构建了统一化、标准化的管理、经营、销售格局, 以专业化、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发展框架、丰硕的业绩成果吸引大批社会力量进入乡村, 实现产业集群的汇集。

对册亨县引进贵州矛香猪业(集团)有限公司构建矛香猪相关产业集群的具体细节进行剖析, 价值创造过程如图5、表3所示。

册亨县位于贵州省, 是布依族聚居地。布依族一直流传着杀年猪的习俗。良好的生态、气候和交通等优势, 让册亨县积淀了独特的发展优势。2020年, 册亨县依靠特有的地理和环境优势吸引贵州矛香猪业(集团)有限公司入驻, 构建“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此种发展模式使企业能够从龙头企业内获取互补型资源并逐步在市场上扎稳脚跟。致力于实现生产高效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目标, 为解决养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当地政府在制定顶层设计时引入更多外界资本, 构建产业联盟, 与品牌企业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在多方力量的参与协作下实现矛香猪产业的高速发展。从“农户自我管理”向以“企业主导、农户主体”产业结构过渡, 使乡村实现了由基础农业到技术农业的跨越。在企业共享市场信息情况下, 农户实现由产业内部的资源调整向资源的协调过渡的过程, 以适应差异化市场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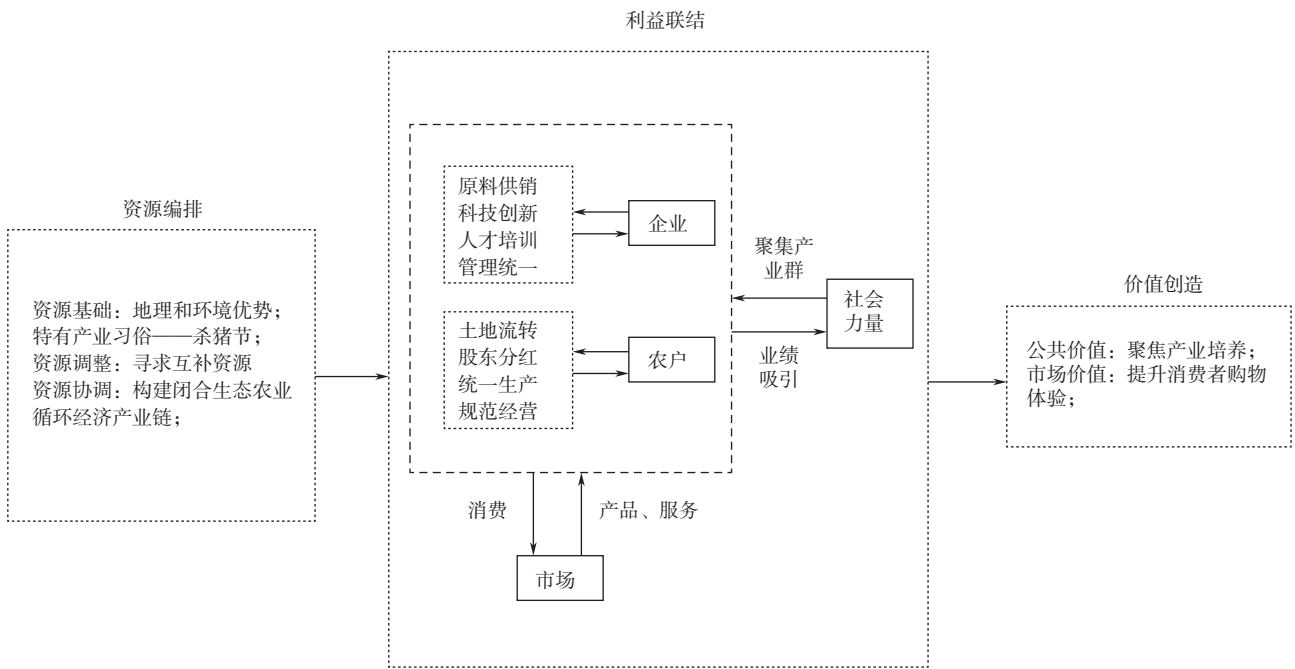


图5 册亨县“龙头企业+农户”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3 “龙头企业+农户”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优质而廉价的猪饲料; 良好的生态、气候和交通优势, 为册亨县养猪提供了独特发展优势; 特有习俗——杀年猪;	独特发展优势

表3(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调整	加入产业联盟、与品牌企业合作方式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寻求互补资源
	资源协调	围绕矛香猪构建相关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标准化、科学化、规模化等生猪养殖产业; 构建闭合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引入多家加工厂与销售企业;	产业集群; 生态; 引入企业
利益联结	资源融合	“龙头企业+农户”为主,社会力量为辅; 从“农户自我管理”向以“企业主导、农户主体”产业结构过渡;	企农联合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模板; 聚焦产业培育,做强特色产业	发展模板; 做强产业
	市场价值	聚焦企业优势,增强帮扶实效;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购物体验; 帮扶实践

(三)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结合“农业供给侧改革”“农村产业融合”“乡村振兴”等时代背景,当地政府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力,吸引企业入驻乡村,旨在从生产端、销售端等多方面切入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实施开放型资源编排方式,在开放的基础上将各方的资源、技术等要素整合于乡村空间系统内,建立统一规划管理。

为实现乡村产业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乡村在统筹自有资源的条件下通过开放型资源编排行为,将资源与多要素进行有效的衔接,跨越了高低级资源间的联结鸿沟,有效地促进乡村跳脱舒适圈进入到自身积累、收集、组合、再建、重组等获取资源的结构中。从开放的视角看,这有助于乡村、企业、政府之间形成利益联结关系,建立多元化的资源结构体系,为后续乡村产业发展助力数字经济、金融等方面提供内在发展动力。资源在开放的过程中突破了组织边界的限制,借助政府平台实现资源的跨级流动,实现乡村产业价值创造效率最大化与跨行业的资源融通多元化。

乡村资源开拓行为推动着政府与企业主动介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利益联结,在跨级资源共享的同时达成平台内资源融通效应。比较多方融合效应下的资源编排行为,资源协同效应虽巩固了资源基础,但在当前“农业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单一以市场或政府为主导的形式无法达成现有的产业发展目标。由于企业不解决脱贫问题,同时当地政府无法凝聚资源于平台上,因此需要政府和企业以资源开拓方式提升内外部资源联结结构,提高结构的主动性和稳固性,以实现资源价值创造最大化。农户、企业和政府三者通过利益联结关系,吸引外部组织建立产业集群,共同赋能多业态发展方式,推动“资源互通互融、多业态创新融入、产品服务多样性、跨级共创共享”的产业循环形成,实现了资源开放共享。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如图6所示。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的乡村产业主要依靠政府与市场双驱动成长。乡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若没有市场压力的驱动,乡村很难摆脱对资源能力的依赖,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政策规划的引导下,乡村秉持发展理念形成全新的发展格局。在双向引导下,政府与龙头企业签订协议共促农户特色产业发展,对外输出新消费理念、特色产品。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乡形成“政府+企业+农户”模式,其价值创造过程如图7、表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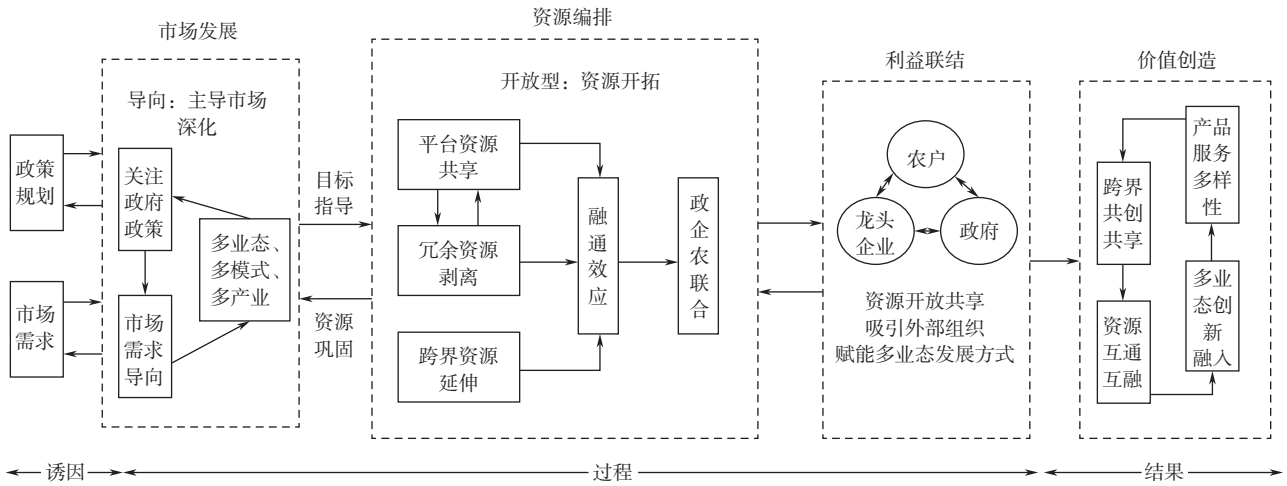


图6 “政府+企业+农户”的价值创造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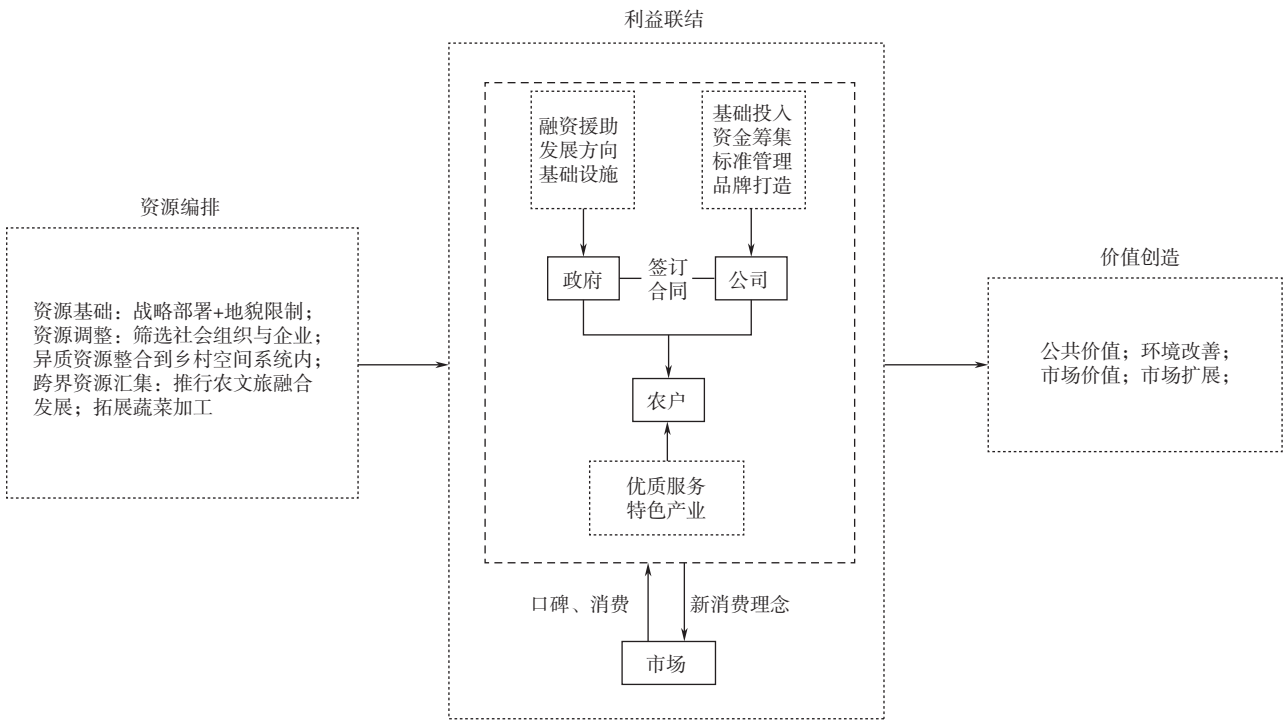


图7 毕节市新仁苗族乡“政府+企业+农户”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4 “政府+企业+农户”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产业强省”“产业强州”的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新跃升 零散型种植发展 聚集优势单品规模发展	蔬菜产业; 零散发展; 规模效应
	资源调整	政府依靠丰富经验与机会识别能力, 从社会中筛选出发展蔬菜产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获取异质性资源与乡村现存资源一同整合到乡村空间系统内;	筛选企业和社会组织; 整合异质性资源

表4(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汇集	依托农村特色优势产业,根据“专家+基地”的扶贫工作模式,解决产业发展的各类技术难题;开展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蔬菜新型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推行农业文旅融合发展; 拓展蔬菜加工	特色优势产业、 科技成果转化
利益联结	资源跨级	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指导、农户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结构	政企农联合发展;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改善环境,广开“才”路	环境改善;
	市场价值	加强服务,拓展市场	市场扩展

作为典型岩溶山区,大部分乡村不具备发展规模农业的条件。为此,毕节市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2020年,当地政府从山东寿光引进一家蔬菜种植企业,形成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指导、农户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结构,农户与政府、企业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共识、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政府依靠丰富的经验与机会识别能力,从社会中筛选出发展蔬菜产业的优质企业和社会组织,获取异质性资源与乡村现存资源一同整合到乡村空间系统内,剥离陈旧的资源,形成结构合理的良性资源池,建立战略联络,实现资源的多元化分配,在价值创造中不断形成、整合所需资源。政府引导企业在发展蔬菜产业过程中完善乡村治理、生活富裕、自然面貌等方面,形成公共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协调。

四、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价值创造的异质性

三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源编排的行为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成熟农户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内部资源的匹配;“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吸引外部资本实现内外部资源的融合;“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发挥中介作用,坚持公共、经济与生态的多元目标,有选择性地引入跨级外界资本,实现开放性资源开拓。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中,内部资源的匹配是指在当外部因素较为薄弱,组织力量未发挥作用且外界资本未介入乡村,农户只能依靠自身资源禀赋以及地域特色,通过成熟的农户带动其他农户发展。内部的成熟农户传授技术、管理经验等能够快速弥补普通农户关键资源的空白,打破隔行资源约束,为快速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奠定资源基础。在资源利用上实现效率型资源编排,应当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化配置为前提,发挥资源组合效应来落地匹配市场的需求,以此与市场、消费者建立密切联系,建立资源价值创造机制。

“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中,内外部资源的融合是指乡村凭借特定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外界资本,资本通过评估当地产业资源禀赋、未来产业发展规模和效益等基本情况,筛选出更具可塑性的产业和区域,以资本入股,与农户合作组建区域化品牌,助力乡村产业快速形成龙头企业并带动周边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乡村在资源获取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协同方式将所吸纳的资源与互补资源进行融合后自用或再创。在巩固资源基础的同时,弥补了资源的薄弱点,从多方面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并实现价值创造、提升潜在价值。在龙头企业的帮扶下,乡村实现了资源的反哺,弥补了单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缺陷,在筹集资源、分配资源等方面避免了盲目性与矛盾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中,开放性资源开拓是指当政府以惠民政策和信誉聚集企业与资本帮扶乡村产业。在政企的资助下构建产业集群,通过资金、信息等集聚效应促进企业良性竞争,共筑多元化产业链。在受到政府政策引导、市场需求的共同影响下,由资源协调跃升到汇集跨界资源,将不同行业、区域内的资源汇集到同一个平台内,再依托资源开拓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与跨界延伸,集

聚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多方力量共同建立标准化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 在生产产业发展中具有资源的绝对话语权。同时, 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不断开拓产业发展边界, 发展“互联网+”“电商+”等衍生模式, 使乡村产业发展逐步跨越到融合发展的模式中。

尽管在乡村产业发展阶段由政府或龙头企业带动的乡村产业体系较为完善, 但市场边界和组织边界的局限性开始制约乡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进一步发展, 如何跨越这些界限, 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了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价值创造的异质性

项目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
资源编排	发挥内部资源的匹配效应; 通过“短期资源采办—特定资源开发—专业资源分配”资源编排方式突出效率性资源获取	发挥内外部资源融合效应; 通过“新旧资源重组—互补资源协调—优势资源聚合”资源编排方式突出互补型资源协调	发挥内外部资源融通效应; 通过“平台资源共享—冗余资源剔除—跨级资源延伸”资源编排方式突出开放性资源开拓
利益联结	农户(成熟、待发展)	龙头企业、农户为主	政府、企业、农户为主
价值创造	缺口资源获取、资源重组利用、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反馈满足	互补资源汇集、资源高效协调、产业优势互补、多元相互协作	资源互通互融、多业态创新融入、产品服务多样性、跨级共创共享

这三种模式并不是静态不变的, 而是经过资源的获取、融合、开拓等过程实现迭代升级。乡村资源编排行为与利益联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的迭代进阶的过程, 是实现乡村产业模式变动的内在动力。

市场需求、政策规划及农户内部的发展条件等因素的主导性转换是触发乡村产业变更发展模式的外在推动力。乡村产业在未来的市场发展导向下应当进一步引导乡村选择适宜的资源编排行为以此突破产业发展障碍, 解决资源受限等问题。充分调动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 发挥资源整合、利用效应, 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当内部资源潜力被最大化挖掘后, 乡村力求更进一步发展, 开始引入外界资本, 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整合, 打造区域化品牌, 建成本土企业。

以安吉白茶为例, 2003年探索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 但受制于技术、管理、资金等因素无法最大化挖掘既有资源的内在价值, 需依靠自身禀赋、地理条件等优势, 吸引外界资本进入乡村, 形成特有白茶品牌并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

一些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秉持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随着规模扩大、引入资本增加, 粗放型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峻, 亟需引入政府部门制定顶层规划设计乡村未来发展路径, 以规划引导、模式指导、政策指引方式指导乡村产业发展过程, 实现各主体的重新分工与协作, 推动乡村形成多业态产业模式,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 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中生态与市场目标的矛盾。

以册亨县引入贵州矛香猪业(集团)为例, 在构建的“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下, 虽然从龙头企业获取互补型资源后逐步在市场上扎稳脚步, 但是集约化养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空气、水、土地等污染, 严重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册亨县当地政府主动为养殖过程中存在的生态与经济的冲突问题制定顶层设计, 有选择性地引入其他企业构建产业联盟。

五、结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资源编排理论对形成产业发展模式的应用, 揭示了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下创造价值的

资源编排过程及三种模式的异质性。本文对三个具体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从资源编排入手,完善了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由资源编排到价值创造的内在衔接机理。通过构建政府、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匹配关系,为研究价值创造体系提供了关系和资源基础。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适配产业发展导向的资源编排行为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资源,弥补资源缺口,实现协调、融通,提升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组织形式会反哺乡村产业资源结构,能进一步丰富资源价值,增加资源储存量。

(2) 结合乡村发展模式及自身资源优势确定的产业发展导向成为资源编排行为选择的外在动因,其中资源编排行为是有目的性、能动性管理利用资源的行为,在将资源转换成能力后产生行为的过程,是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3) “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与“政府+企业+农户”模式三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编排行为的差异,资源编排行为在经过资源的获取、融合、开拓等过程中实现动态变化。即资源编排与利益联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的迭代升级,乡村在挖掘自身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为进一步发展,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外部资本,形成本土龙头企业,但生态与经济目标的冲突亟需由政府把控引入的企业,聚焦重点、聚集资源、聚合力量,制定生产标准,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发挥“引领、服务、监督、推动”作用。

(二) 理论贡献

本文将资源编排理论应用到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上,总结了不同情景下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在市场或政策的引导下资源编排的差异化特点,解析了资源能动性配置下的价值创造特点,丰富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内在发展过程研究。以往研究大多从实证入手,探究乡村为形成某一种特定的产业,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的乡村产业振兴^[13-14],而本文主要提出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资源构建凝结成能力,采取行动实现价值创造的流程,弥补了大多文献中所缺失的过程阐述。

本文扩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范围,实现了从多角度剖析乡村产业模式的动态演化与实践机制。本文提出农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编排过程理论模式,对已有模型编排进行了深化^[15],提炼出资源编排理论应用于乡村产业实现价值创造的独特机制,将资源编排的应用范围由关注企业发展^[8,16]延伸到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机制上。

(三) 实践贡献

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有利于拓展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以多元化、多业态的角度看待乡村产业发展。相较于以往关注依靠外界资源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本文按照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为主体划分“农民专业合作社”^[17]、“龙头企业+农户”^[18]和“政府+企业+农户”^[19]三种基础发展模式,分析乡村产业在撬动内在资源,激活自身内在发展活力,实现内外资源整合的过程。本文结论可以为乡村因地制宜地匹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改进,衍生出“互联网+”^[20]、“数字经济+”^[21]等产业发展模式。其次,乡村产业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要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式。对于外部力量相对薄弱且较为偏远的地区,农户可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当有能力吸引外部资本后,乡村可以积极构建“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为促进良性循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可以引入政府力量形成“政府+企业+农户”模式。

(四) 研究局限与不足

未来需要细化更多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引入多种社会组织,分析其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机制。同时需要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或大样本数据验证本文成果,以此增加结论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刘明月,冯晓龙,冷滢潇,等.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制约因素与模式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21(10):51-63.

- [2] 马国栋,李彦霞. 新时代乡村振兴知识图景:热点、向度及发展研究——以第一个五年文献资料为基础[J]. 学习与探索,2023(1): 37-44.
- [3] 童广印,王璇,孙丽萍,等. 基于文献计量的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热点挖掘与未来展望[J]. 安徽农业科学,2022,50(21):235-239.
- [4]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1390-1412.
- [5]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1): 273-292.
- [6] 韩炜,杨俊,胡新华,等. 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塑造商业生态系统属性差异? ——基于两家新创企业的跨案例纵向研究与理论模型构建[J]. 管理世界,2021,37(1):88-107.
- [7] CARNES C M, CHIRICO F, HITT M A,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or innovation: structuring and bundling resources in growth-and maturity-stage firms[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7, 50(4): 472-486.
- [8] 黄昊,王国红,秦兰. 科技新创企业资源编排对企业成长影响研究:资源基础与创业能力共演化视角[J]. 中国软科学,2020(7): 122-137.
- [9] 谢洪明,章俨,刘洋,等. 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中的价值创造:均胜集团的案例[J]. 管理世界,2019,35(5):161-178.
- [10] 王国红,黄昊. 协同价值创造情境中科技新创企业的资源编排与成长机理研究[J]. 管理学报,2021,18(6):884-894.
- [11] CAI L, ANOKHIN S, YIN M M, et al. Environm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new ventur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China[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 12(2): 333-356.
- [12] 彭新敏,史慧敏,李佳楠. 管理认知、资源编排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35(2):87-95.
- [13] 陈鸣,陈峰,廖世伟.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机制与经验证据[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24(6):14-27.
- [14] 龙云,邓可心,匡诺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带动小农户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吗?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2):85-99.
- [15] BAERT C, MEULEMAN M, DEBRUYNE M, et al. Portfolio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6, 10(4): 346-370.
- [16] 胡海波,王怡琴,卢海涛,等. 企业数据赋能实现路径研究——一个资源编排案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0):91-101.
- [17] 张德峰,谭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本位”的制度回归[J]. 新视野,2023(3):93-102.
- [18] 杨勇.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及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2021(8):41-43.
- [19] 王永成,罗春莲,何红艳. 政府、企业、农户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性机制——基于一个边境县域民族山区的实践分析[J]. 现代农业研究,2023,29(1):45-48.
- [20] 曲甜,黄蔓雯. 数字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研究——以B市P区“互联网+大桃”项目为例[J]. 电子政务,2022(1): 114-124.
- [21] 赵德起,丁义文. 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6):112-120.

Mechanism Analysis of Rural Industry from Construction to Leap: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ory

ZHANG Yan, PAN Yanan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9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revitalize rur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 the inner power of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 multi-case analysis method to build a model of “resource arrangement-benefit connection-value creation”, and explores the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eading enterprises+farmers” and “government+enterprises+farmers”. This paper provides path guidance for rural industries to leverage internal resources, activate their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By applying the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arrang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ket or policy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scenario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analyzes the valu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dynamic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fferent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have different value creation process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mainly relies on mature farmer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o achieve the matching of intern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eading enterprises+farmers” mainly relies on attracting external capital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farmers” is mainly medi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electively introduces cross-level external capital to realize open resource exploitation. (2) These three modes are not static, but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iterative upgrading. The interactive allocation of rural resource arrangement behavior and interest connection highlights the iterative and advanced process between rur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subjects, which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rural industrial model. The dominant transform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market demand, policy planning, and farmers’ inter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s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that triggers the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ture market development, the rural industries will further guide the countryside to choose appropriate resource arrangement behavior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lve problems, and fully mobilize cross-industry and cross-regional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villages make full use of their advantages to attract external capital and form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Due to conflicts between ecological goals and economic goals, to avoi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the role of guidance, service, supervision, and promotion, guide enterprises to gather resources, aggregate forces, and formulate production standards to form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Keywords: resource arrangement; value creation; rural industry; case stud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姜 莱; 沈 娟)